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

贺绍俊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贺绍俊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 - 7 - 5063 - 6125 - 5

I. ①建… II. ①贺… III. ①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6846 号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

作 者: 贺绍俊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7.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125 - 5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贺绍俊

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长年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主要著作有《重构宏大叙述》、《作家铁凝》、《中国节》（与吉国秀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与巫晓燕合著）、《文学批评学》（与潘凯雄、蒋原伦合著）、《铁凝评传》、《还在文化荆棘地》、《鲁迅与读书》、《伊甸园的困惑——文学中的性爱描写》等，发表论文二百多万字。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余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自序

自从摆脱了具体职务的约束，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常常被别人羡慕。因为被羡慕我更不敢虚度时光，在闲暇的时间里读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写了更多的批评文章，每年几乎都有数十篇批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写得多了，就有了一种敬畏之心，惟恐自己的文字伤害了批评的本质。我以为，文学批评之所以被人们诟病，就在于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缺乏对批评本质的尊重和敬畏。尽管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角度可以是丰富多样的，批评家的姿态和立场也可以是不同的，但最终都应该在认同批评本质上取得一致。就我个人来说，我进行文学批评时力图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建设性，二是精神性。

我把批评看成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批评家用批评的方式与作家一起共同建设一座文学的大厦。这座大厦盛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因此我在批评中更多的是立足于精神性去阐发文学作品。关于建设性，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这篇文章就收入这个集子里。至于精神性，我愿意稍微多说几句。

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我常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精神的寺庙；因此，精神性可以说是文学的灵魂。但在消费时代，人们追逐感官刺激、浅层的快感，文学被通俗化、娱乐化和泛化，其精神内涵越来越枯竭，从而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追求精神性的作家就应该特别得到批评家的注目。消解精神性也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自由欲望将经典、英雄、理想、使命以及上帝等等，这些曾让人们敬畏和仰慕的内容，视为精神的威权，并摧毁了由威权建构起来的精神圣殿，这固然可以说是自由精神的胜利，但对于文化进程而言，我们要摧毁的只是精神的威权，而不是精神本身。中国的当代文化也许走到了这一步，在摧毁精神的威权之后，迫切需要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毫无疑问，文学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有着





哲学、政治、社会机制、知识体系等都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在重建精神家园方面突出体现在民族精神的重建上。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民族精神不仅经受了巨大的挑战，也再次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新的磨炼、丰富和扩展。民族精神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小说是在各种理论思潮和社会变革的双重作用下开拓自己的精神领域的；反过来说，我们从当代小说精神内涵的变化可以把握到民族精神的脉搏，可以看到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进行改造和重建的，可以看到民族精神重建的艰巨性和可塑性。因此，研究新世纪小说中的民族精神重建，是一个适时的、具有一定的学术开拓空间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文学艺术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可以也应该发挥其独特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承载的民族精神的重新阐释，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有益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其二，当代小说的精神容量经历了波浪型的起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和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说为了摆脱过去僵化观念的束缚，一度热衷于形而下，作家们痴迷于故事性、技术性，大大淡薄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逐渐重视故事背后的精神性的追问，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也带来小说艺术的突破，充分说明小说的文学性是和精神性密不可分的，因此，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体现的民族精神的研究，对于如何坚持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开掘民族资源，将作出比较实际的理论概括。

研究小说中的民族精神，自然会以小说的思想内容为基本研究对象，但它不是一般的思想主题的分析，而是紧扣着民族精神，因此首先要对民族精神的内涵、传统承传、动态趋势等作出明确的界定，重点之一在民族精神对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思想主题开掘和深化等方面是如何发生影响的。重点之二在对“重建”的阐述。因此要在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现实状况作出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廓清民族精神在当代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所在。特别要研究文学在民族精神重建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以及民族精神的重建又是如何构成小说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原因。

重建民族精神，也就成为这些年来我进行文学批评时的一个基本的切入点和学术目标。我发现，民族精神与其民族的文学精神具有内在的



关系，民族精神的生成、消长和发展状况，也是该民族的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也许涉及到民族精神与文学性的关系的问题，但关于这一点，尚没有现成的理论依据。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历程提示我们，小说精神内涵的丰厚与否，是决定小说能否起到心灵慰藉和净化的首要因素，但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批评方面，大家对此都重视不够。20世纪80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着启蒙和拯救的社会职责，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大于精神文化的意义。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激化下，虽然小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拓展精神层面，不过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流，坠入形而下的层面。新世纪小说出现了可喜的反拨，开始从形而下回归到形而上，同时也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强调，小说相应地也注重起精神内涵的追求了。这是我在这些年来阅读和批评小说的过程中感受特别强烈的一点。我在批评实践中也力图表达我在这方面的体会，不知道读者能否从这本集子的文章里觉察到这一点，如果有所觉察，我就倍感欣慰了。

目 录

自序.....	1
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1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6
从精神性到典雅性	12
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	20
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	26
核心价值与普适价值的辩证关系	38
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优雅语言	41
回到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基本常识中来 ——卧底写作引发的议论	46
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 ——2005 年中短篇小说评述	49
肩负现实性和精神性的蹒跚前行 ——2006 年中短篇小说述评	63
小说自成系统的平稳演进 ——2007 年中短篇小说概述	74
波澜不惊的无主题演奏 ——2008 年中短篇小说述评	85
蕴藏着一个未来的惊喜 ——2010 年短篇小说述评	97



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	
——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	105
以青春文学为“常项”	
——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	116
新世纪长篇小说四题	125
大国气象·政治同构·文体意识	
——新世纪报告文学刍议	143
网络文学:新世纪的一份厚礼	
——关于网络文学的革命性和后现代性及其他	151
以战争解答和平年代军事文学的难题	
——谈新世纪军事文学的转化	165
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共同性以及文学社区命题	170
工业题材的视域和主体性问题	175
从革命叙事到后革命叙事	180
从苦难主题看底层文学的深化	185
意义、价值和蜕变	
——关于打工文学以及王十月的写作	192
我们今天到底希望草原上兴起什么	200
从藏族文化影响论及少数民族文学的“后视镜”	206
新政治小说及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	
——周梅森论	211
中国的“小林多喜二”在追问	
——读曹征路的《问苍茫》	221
《笨花》叙述的革命性意义	
——重读《笨花》及其评论	230
现实主义的意义重建	
——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读解范小青的创作	240
从《无字》看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251
最后的浪漫主义革命者	257
嵌入现代性中的前现代精神价值	
——以宁夏文学为例	263
后记	269



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伴相随，共同建造了一座文学的辉煌殿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在探寻文学批评所起的作用和功能，这种探寻尤其是从初步确立起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后，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文学批评的作用和功能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文学批评家会侧重于发挥文学批评的某一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这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姿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官与导师的姿态统领着文学批评的园地，大多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在解释文学批评时，也都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分析和判断的活动。众多的文学批评家认真履行着法官与导师的职责，但他们的工作不见得会让作家们买账，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玄机的精神产品，要对其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非易事。并非人们不接受文学批评家以法官与导师的姿态出现，问题在于，在这种姿态下，文学批评家是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以什么为评判的标准，却是难以统一的。公正的立场，评判的标准，这就涉及到文学批评家其他方面的素养。当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以及道德准备难以让人们信服时，其批评就难以被人们接受。托尔斯泰就讥讽批评家是“聪明的傻瓜”。有的作家则声称他们根本不读文学批评。如果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长期处于这种对立的状态，文学批评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文学批评中的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似乎就注定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只能处于对立的关系。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为了解决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干脆主张由作家自己来当批评家。他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所谓大师的批评，也就是指那些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作家所进行的文学批评，也就是作家自己来当批评家，蒂博代最为推崇大师的批评，他认为，大师们既然是作家，就会努力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进行批评，他看待别人的作品时，就会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之心。说他们的批评“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



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按蒂博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职业的批评家都要失业，而作家从此兼上批评家的职责，大概也就无暇顾及创作了。蒂博代的办法并不高明。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评者是作家的身份还是职业批评家的身份，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姿态。文学批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以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出现的，这是与人们的认知思维的历史处境相适应的，在人类文明的创立阶段，人类主要面临的任务是对未知世界进行认知和判断，文学作为一门人类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同样需要进行认知和判断，因此文学批评首先担当起了认知和判断的功能，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家最初所采取的姿态是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但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随着现代思想的深化，人们对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了逐渐深入的把握，意识到不能停留于简单的认知和判断，否则会有损于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文学批评家逐渐觉悟到，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不仅得不到作家们的广泛认同，而且也无助于文学批评的正常开展。因此许多文学批评家在批评的姿态上做出了调整，采取了一种对话和交流的批评姿态，通过文学文本与作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达到审美的共振。

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以后的认知世界的趋势。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 20 世纪初就认为，“你—我”、“我—他”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关系，“你—我”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关系，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你”而成为“我”，因此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而获得相互性的尊重与追求。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也论证了个体所具有的通过自我、他人进而在更高层次上理解普遍性实体的可能性。巴赫金发现了对话的三个基本特征：开放性、未完成性和语言性。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性的，而生活是无限的，不可能终结的，对话总处在不断运作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永远是多种声音的对话。哲学家们意识到，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索的方式，哲学通过对话来打开一个新的视域，新的创造便寓含在这一过程之中。对话和交流吻合了多极化、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是哲学发展和创新的有效途径。

这种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也同样表现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领域。因此，从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到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文学批评家在姿态上的一种进步的表现。对话与交流的批评姿态改变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状态。在法官与导师姿态阶段，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



的交流，但这是一种单向度的交流，是批评者向批评对象施予式的交流，因为当批评家采取法官与导师的姿态时，就预设了一个真理掌握者的前提。而在一元解读现象破灭以后，那些以真理掌握者自居的批评家反而遭到了人们的抵制。对话并不是自说自话的众声喧哗，而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面对一个具有客体化内容的文本在一定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内进行的协商。因此，对话既包括对多元性与差异性的追求，也表达着对宽容与共通性的渴望，是一种交织着主动与被动、多元与一元、断裂与联系的复合过程。如果说批评的本体价值在于建构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建构又是以作品意义的阐释为基础的，那么，阐释作品意义的途径对于批评价值的实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托多罗夫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当代批评所作出的调整，他说：“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汇合。”

当文学批评家采取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时，批评的功能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批评不再侧重于是非判断，而是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探寻。蒂博代明确地否决了法官的姿态，他之所以对职业的批评颇多贬义，就在于他反对职业批评家以法官自居的传统，但他没有找到克服法官弊端的好办法，只好让作家来接替批评家的工作。德国文学批评家赫尔德的办法就高明些，他的办法就是强调交流和对话，他认为“批评家应当设身地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怀着作者写作时的精神去阅读他的作品，这样做有困难，然而却是有道理的。”当他以这样一种交流和对话的姿态去进行文学批评时，自然就会立足于建设性，因此他说：“我喜欢我所读的大多数作品，我总是喜欢找出和注意值得赞扬而非值得指责的东西。”当然，建设性包含着赞美和肯定的意思，对作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创新给予赞美和肯定，但建设性并不意味着为了赞美而赞美，建设性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也就是说，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话与交流的批评姿态虽然不再侧重于是非判断的批评功能，但并不是彻底放弃判断，而是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来传达判断。中国现代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就是力倡批评的建设性的，他对建设性的理解是：“同时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



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犹如我们批评的祖师曹丕，将有良好的收获和永久的纪念。”李健吾将“摧毁”与“建设”对举，更加突显了建设性批评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批评的目的不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敌人将其摧毁，而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有价值的东西，同时要与作者一起共同将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建设好。这就决定了批评家的温和善良的批评态度：即不是从恶意出发，而是从善意出发；不是从否定和摧毁对象出发，而是从肯定和扶持对象出发；不仅从自我出发，而且从能够兼顾他我出发。在李健吾看来，以建设为宗旨的批评可能会用上赞美和恭维，但批评不是“一意用在恭维”，“一个批评者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既“用不着谩骂”，也“用不着誉扬”，而必须做到“言必有物”。鲁迅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和批评家，即使如此，在鲁迅的批评观中，同样注重建设性。鲁迅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了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鲁迅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建设性的意义。如果说批评家面对的批评对象只是“满天星”的野菊花，但它毕竟是“佳花的苗”，那么，建设性的批评就是要指出它的潜在的价值，指出它能够培育成“菊花”来的潜在事实。建设性批评的背后透露出文学批评家的善意。尽管不能断然说凡是破坏性的批评都是出于文学批评家的一番恶意，但一个批评家如果怀着恶意的姿态去进行批评的话，他的批评肯定是不具备建设性的。因此鲁迅尽管在批判中毫不留情，但他对恶意的批评家却是非常反感的。他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鲁迅坚定地表示，对于这样的恶意批评家，“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建设性是对话的必然归宿。在文学批评中采用对话的姿态，就意味着批评者以平等的方式与批评对象进行交流，批评者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当成是不可更改的结论，而是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在交流和对话中，让双方的观点相互碰撞和渗透，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而建设出一个新的文学形象。这就是建设性的效果。相对来说，建设性的批评比破坏性的



批评更加艰难，因为批评家要从批评对象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哪怕这种价值还很微弱，隐藏在大量平庸的叙述之中，批评家也很珍惜这点微弱的价值。破坏性批评以求全责备的态度对待批评对象，往往以轻率的否定让作家煞费苦心的努力化为泡影。破坏性的批评就像是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在嫩苗的地上驰马”，这对批评家来说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但更容易给作家以及文学事业造成伤害。其实，无论是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还是采取破坏性的否决，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都是合理的，有时当文学处于僵化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中，破坏性批评反而能带来振聋发聩的作用。关键问题还在于批评家的姿态，也就是说，即使是进行破坏性的批评，批评家也不是怀着恶意的姿态，而是从善意出发。当批评家怀着善意的姿态去进行破坏性的批评时，他的目的是要通过破坏引起作家的惊醒，他就会谨慎地使用破坏性的武器，以免伤及无辜。鲁迅在批评实践中不乏破坏性的、战斗性的批评，鲁迅并不反对破坏性批评，他所反对的是批评家在批评中采取类似于“迎头痛击，冷笑，抹杀”等各种恶意的姿态，对恶意姿态的批评，鲁迅坚定地表示“置之不理”。今天，文学在众声喧哗中只是比较微弱的一种话语，尤其需要文学批评以建设性的方式给以帮衬。当然，当下的文坛也流行着献媚的批评、溢美的批评、说大话的批评、表扬至上的批评，但这些批评都不能与建设性的批评划等号。前面所列的批评都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要舍得丢掉面子、降低人格，就能办到。而建设性的批评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的，是要真正研读文本、思考问题的。因此，建设性批评兴旺发达起来后，那些乌七八糟的批评才会偃旗息鼓。

批评家从法官和导师的姿态转变为对话与交流的姿态，吻合了思想文化演进的趋势，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批评的标准。当批评家以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出现时，批评标准无疑是手中最有效的武器。而当批评家采取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时，他就不认为文学世界只能由他来作出决断了，他要倾听作家、读者的想法，他要在对话中学习别人的智慧，从别人的意见中吸取有用的内容，他在对话中也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想法。那么，在对话与交流中批评家还有没有自己的批评标准呢？答案显然是有的。这一点应该毫无疑义，只不过此时的批评家在处理标准的方式上与法官和导师式的处理方式不一样而已。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又出版了一本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的新版本，这并不是一个多大的新闻，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我们文艺的指导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著作出版了很多的版本，这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情。如今又出一个新版本，在译文上更加精准，在选文上也有新的考虑，这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我在参加为这个新版本而举行的研讨会时仍然收获了不少感慨。

我听到非常年轻的批评家说，他们是第一次阅读其中的一些文章，他们才发现，马克思的文章写得是这么的有文采。也许他们的发言有某种策略性的考虑，但应该承认他们的发现是由衷的。我们总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唯一性和权威性，于是人们就不再注意马克思的文采了。我想，马克思的著作在我们的身边应该是轻易就能获得的书籍，然而人们也许太容易获得，反而熟视无睹了吧。今天有年轻人注意到马克思的文采，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不过还有比文采更重要的问题，年轻人能否发现呢？就说这本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吧，收入书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马列文论的经典文章，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必读文章。但即使是这些文章，如果是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批评家来读的话，是不可能真正读懂的。这并不是说马列文论是多么晦涩难懂的读物，恰恰相反，马列文论在文风上都是清新明快的，但是，有的人也许只能读懂字面上的含义，而不能真正把握到这些文章的思想价值，因为马列文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文学理论，不了解作为基础的哲学思想，遑论对马列文论的了解。马列文论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独立存在，一个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思维的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列文论的精髓。